

城市居民网络政治 参与行为研究

Research on the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黄少华 著



科学出版社

城市居民网络政治 参与行为研究

Research on the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黄少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备受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本书主要基于社会学理论视角,并结合政治学和传播学理论,遵循实证研究范式,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数据和资料收集方法,以及统计分析、类属分析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引导和控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关注网络政治议题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研究 / 黄少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03-054929-7

I. ①城… II. ①黄…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市民-参与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8023号

责任编辑:朱丽娜 / 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联系电话:010-64033934

电子邮箱:edu_psy@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2

字数:210 000

定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互联网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军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互联网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所不在的角色。网络化已经是时代的大趋势。从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基础建设，都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在网络时代，从社交、认同、表达、隐私、健康、消费、休闲、交通，到生产、创新、参与、社区、发展、教育、知识、传播、安全、价值、治理等，都与互联网密切相关。互联网已经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成为重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甚至经验结构的重要力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今天，所有的社会科学议题，都已经无法忽略互联网这一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今天各门社会科学争论的焦点，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网络社会领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如何理解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不同议题，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但是，其中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结构系统清晰地理论梳理或经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有关的讨论要么只是基于已有政治参与理论，直接应用现实政治参与概念分析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把网络政治参与视为现实政治参与的延伸或特例；要么只是立足于某类网络政治参与现象，来界定和使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概念，把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讨论局限在某些类型的现象上。鉴于此，我们尝试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和归纳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结构、维度和特点的测量指标，编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量表，作为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定量研究的基础。同时，鉴于“人类行为是复杂而多侧面



的,单一一种理论视角远远不能涵盖其方方面面”(安东尼·吉登斯,2009:20),我们尝试同时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公民自愿模型和结构化理论等多种理论视角,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多角度的实证研究,以更全面地揭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行为逻辑。我们的这种理论尝试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匿名评审专家的首肯。专家认为,本书研究视野开阔,问题把握精准,分析框架完整,方法运用妥当,实证研究深入,学理阐释充分,文风朴实,表达清晰。下面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

互联网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一个全新场域,也正在引发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研究成果基于社会学分析的理论视角,结合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厘清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探析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和逻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该成果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该研究成果不仅对相关理论背景有娴熟的掌握和精准的分析,而且在编制网络意识和网络行为量表的实证研究环节,系统严谨,构思精巧,并有所创新。近年来,有关网络意识和网络行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文献逐步增多,但其中系统掌握国内外研究文献者以及相对规范的调查成果并不多见。网络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理论成果相对零散,调查方案设计和操作尚无成熟的模式可以遵循。该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将社会行为与网络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在采取一般抽样调查的同时,结合深度访谈和定量的信度测试,设计出了较好的问卷调查项目,这对今后的网络研究颇有探索和借鉴意义。

第二,深入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和逻辑,并有若干重要发现。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行为结构和行为逻辑与现实政治参与行为是有差别的。该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网络使用行为的确对线下政治参与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作为网络信息行为、社交行为、表达行为的浏览新闻、使用即时通信和微博,对线下政治参与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作为休闲娱乐行为的网络游戏和作为经济行为的网上购物,对线下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作用。这对我们了解网络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建构特征具有重要价值。该研究还分别使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动机和网络政治意识,关照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有客观中肯的分析,对我国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和社会控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该研究成果借助结构化理论关照网络政治意识研究，把网络政治意识引入网络政治参与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已有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研究的解释框架。而该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了网络政治意识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网络政治参与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本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有匿名评审专家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学论题，需要考量现有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本书过于偏重对社会因素的考察，对政治制度的考量不够；本书缺少对我国现有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引导与控制现状的评估，缺少有关建构健康有序文明的网络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的论述。虽然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讨论的边界，并不需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上述议题的确是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另外，本书中若干不同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发现，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现实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被弱化，而网络政治意识的影响被凸显出来，这种变化所隐含的实质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都需要依赖更深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来给出恰当的解释。

黄少华

2017年6月20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现状 / 6

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21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 2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30

第三章 上网动机、网络意识与网络行为 / 38

第一节 上网动机 / 38

第二节 网络意识 / 48

第三节 网络行为 / 57

第四节 上网动机、网络意识与网络行为的关系 / 72

第四章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 75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量表的编制 / 75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与现状 / 86

第三节 线下政治参与行为 / 96



第五章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 103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 103

第二节 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 116

第三节 政治动机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 124

第四节 网络政治意识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 131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141

第一节 结论与讨论 / 141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149

参考文献 / 156

附录一 城市居民网络行为调查问卷 / 165

附录二 网络道德同侪压力测量：量表编制与检验 / 172

索引 / 183

后记 / 187

第一章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下半叶，三个独立的社会进程，即管理的灵活化及资本、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以个人自由和开放交流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以及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基础的计算、通信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几乎同时出现（曼纽尔·卡斯特，2009：16）。这三个看似独立的进程，共同推动着一种以网络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新社会结构的崛起，推动着人类社会快速迈向一个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今天，作为一种兼具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的技术，互联网正越来越密切而深入地融入人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与互联网相连，获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网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的调查，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 6.8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首次超过 50.0%，攀升至 50.3%。互联网不仅迅速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而且全方位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信息搜寻、移动媒体、网络互动、电子商务、网络消费、电子政务、网络参政、网络游戏、虚拟现实等网络应用形式的不断涌现，使得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交往和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助网络，人们可以接收新闻、发布消息、通信联络、看电影、听音乐、收发邮件、结交朋友、撰写日记、表达意见、分享心情、购物、下载资料、玩游戏、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互联网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空间，由互联网崛起而形塑的网络空间，已



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一个全新场域^①，也因此成了社会行为研究的一个全新场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目前所有社会科学议题，都已无法忽略互联网这一重要的变量。其中，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更是得到了国内外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匿名、弹性、流动、去中心、网络化的空间，这一技术空间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一旦经由人们的社会行动，将互联网的这种技术特性扩展渗透到整个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的实质性转变（曼纽尔·卡斯特，2003：567）。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互联网塑造了一个不需要身体共同在场的虚拟公共空间，因而大大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

首先，互联网为政治参与创造了一个虚实交织的实践空间。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技术空间，而且是一个由共识、想象和兴趣凝聚而成的新社会空间。在这一社会空间中，各种传统的社会边界和社会机制正在发生转变。例如，拟像符码取代工业时代的生产，成为构造社会结构和经验结构的基本力量，并消解了拟像与真实之间的差别。在网络空间中，拟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其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不仅拟像与真实之间，而且存在于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的社会边界，也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模

①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比尔·盖茨（Bill Gates）、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和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就分别出版了《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比特之城》（*City of Bits*）三本讨论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未来学著作。其中比尔·盖茨强调，人类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在未来 20 年，互联网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无形背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构成强大影响，甚至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主流中的一部分，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网络使用程度（比尔·盖茨，1996）。而尼葛洛庞帝则强调，在信息时代，“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1996：15），比特作为“信息的 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迈向数字化生存时代，而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则构成了数字化生存的四个基本特质。米切尔在分析网络时代城市变化时强调，“在这样一个时代，城市的概念受到了挑战，而且最终必将重新定义。计算机网络像街道系统一样成为都市生活的根本”（米切尔，1999：104）。比特之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人类大多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都转移到了网络空间中。



糊不清，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超越现代社会二元区分的混合世界中（黄少华，2003）。互联网通过对各种现实社会边界的不断消解和重建，创造了一个新的行动空间，吸引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中，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展开交流、讨论和行动。这是一个比现实社会空间更加广阔、开放、自由、灵活、自治的公共空间。

其次，互联网使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变得十分容易，并因此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加了其政治和社会宽容度。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政治信息的获取，是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的前提。网络媒介的兼容性、交互方式多样性特点，使其汇集、传播的信息十分庞大和丰富，这有助于网络使用者扩展政治视野，增加政治知识，减少政治冷漠。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不仅使巨量信息的快速、廉价传播变得可能，而且极大地方便了网络使用者主动发布信息。这种主动发布，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提升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网络空间中多元政治信息的呈现、传播和交汇，以及各种不同观点的分享、争论、竞争和交锋，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意见、观点的容忍力与接纳力，培育理性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宽容精神。

最后，互联网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网络互动的便捷、低成本、跨时空限制、身体不在场、开放、方便在线交流等特点，特别适合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网络互动不仅有助于扩展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有助于地理上分离的人们组成各种类型的在线社会团体，如兴趣小组、宗教团体、健康团体、公益团体、单身母亲团体等，并帮助团体成员展开有效的社会沟通、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这种在线社会团体，有助于促进团体成员的在线甚至线下政治参与。同时，网络互动建构的松散关系网络，能够为人们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对于促进政治参与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网络空间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全新场域，其影响力已开始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6月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在网络时代，网民的许多在线行为都打上了政治参与的烙印，他们在网上对政治和公共议题的关注、表达、讨论、动员和行动参与，都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政治



生活的面貌。无论是“两会”期间的网络议政，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在线交流；无论是网民发起的针对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抗议运动，还是针对政府官员的网络监督，都表明互联网在今天已经成为推动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舞台。互联网不仅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提升了普通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增强了网民的话语权，而且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涵，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超越甚至摆脱时空的制约与束缚，随时随地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動。移动网络技术对交互性的巨大提升，不仅引发了信息大爆炸，有助于人们更广泛地获取信息，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重塑公共事务观念，推动网民的关注点逐渐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官员腐败、社会不公、拆迁、慈善公益等社会问题在网络上被广泛热议，充分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互联网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降低了民众进入公共空间的门槛，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从而使民众可以在网络空间中突破现实社会的时空限制，广泛参与政治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超越在场限制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但是，网络空间中知识与信息重要性的凸显，网络时空特性的转变、流动性成为重要的社会构造力量，过度关联的放大效应和网络行动者的身体不在场也引发了网络空间中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极度增长，从而使风险成了网络空间的内在构成要素（黄少华，2014）。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社会风险。总体而言，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效应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当能动的网络行动者与开放、匿名、弹性、流动、去中心的网络空间相遇之后，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网络表达和网络互动，从而导致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网络空间在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的同时，也在某些层面限制了政治参与的充分展开。

首先，互联网虽然拓展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但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联系，常常呈现出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同质性偏向。除了大量陌生人之间的浅层次交往外，互动和信任程度较高的网络交往，大都局限在那些兴趣相同、观点相似、利益一致的人群之间。网络空间中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的



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原有的意识和立场，仿佛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不存在。凯斯·桑斯坦将这种现象称为“回声室效应”（凯斯·桑斯坦，2003：47）。“回声室效应”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群体极化”，即各种对立的观点越来越走向极端，不同团体之间、团体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从而增加了不同意见群体之间的协调难度，甚至造成网络公共空间的切割和碎片化。这意味着，互联网虽然能够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吸引到同一个信息和行动平台中，但无论在讨论议题的选择上，还是在行动方向的抉择上，互联网并不能消除群体之间的分化与隔阂，而一个健康发育的政治空间，需要不同意见、观点之间的理性交流与对话。

其次，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结果，是传统的社会边界被不断消除和重建，甚至社会边界的建构机制也发生了转变。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实交织的社会空间，在这一虚实交织的网络社会空间中，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之间的边界变得不再清晰，从而引发了个人行为公开化、后台行为前台化。一方面，以前只是作为私人话题的个人情感、内心感受，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针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又很容易被偏激的网络情绪所感染，导致政治讨论沦为网民想象力的肆意发挥和情绪的无原则宣泄。语言暴力、道德审判、煽风点火等非理性行为，就是这种情绪无原则宣泄的具体表现，它们会对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实践构成威胁甚至破坏。

最后，网络空间中行动者的身体不在场，导致了行动不确定性的加剧。当人们认为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其网上行为有可能会变得肆无忌惮，这容易引发负面行为后果。正如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所说的，互联网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让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频繁接触色情文化的年轻人、从事网络盗窃的盗贼、患有强迫症的网络赌博者及各种各样的痴迷者；它诱使我们人类本性中最邪恶、最不正常的一面暴露出来，让我们屈从于社会中最具毁灭性的恶习；它腐蚀和破坏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价值观（安德鲁·基恩，2010：159）。这种因为行动不确定性加剧而导致的负面社会效应，同样会腐蚀和破坏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所赖以展开的价值基础。

总之，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效应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因此，互联网的崛起对政治参与而言，既是机遇又带来了风险。一方面，互联网为中国民众公开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机遇。网络空间作为虚拟公共空间，是培育公民意识的



基础性空间,有助于促进民众政治言论自由表达、公共监督实施及公民意识培育;网络的匿名性、即时性和便捷性也大大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培育了政治参与的良好环境,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网络还消除了身体在场的限制,使政治参与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参与的范围;网络信息的多样性,使多元利益主体得以共同参与,弱势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声渠道和行动组织工具。另一方面,网络也对政治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社会是一个包含内在结构性风险的风险社会,网络信息的极大充沛和多元性方便了民众自由获取信息和自由表达言论,但造成了垃圾信息的泛滥;网络拓展了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的空间,但也有可能引发不同声音之间的对峙与对抗;网络的匿名性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但提高了监管不良信息和言论的难度。所有这些,从不同侧面显示了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尝试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梳理和分析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构和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社会学分析社会行动的理论视角,并结合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近年来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成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现状

互联网强大的突破边界、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潜能,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但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学界迄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乐观论者认为,互联网为政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能够改进目前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Bannister, Remedy, 2003)。互联网提升了政治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数量,降低了网民获得政治信息的成本,方便了网民的人际接触、政治信息交流和讨论,因而有助于提升网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Bimber, 2000)。悲观论者则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复杂性会侵蚀社会资本和社区联系(Zamir, Etzioni, 1999),减少民众辩论和对话(Sunstein, 2001),强化政治信息获得的数字鸿沟,导致部分民众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Jennings, Zeitner, 2003),甚至导致政府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垄断政治信息资源,削弱对政府的监督能力(Akdeniz, 2000),从而使网络政治参与变得低效甚至无意义。同时,互联网提供的多元娱乐内容,也容易导



致人们接触政治信息的时间减少和意愿减弱，并降低传统社会团体对政治运作的正面影响。但无论是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其共同特点是都把互联网视为一个新的要素或工具，认为其转化了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参与行为。依照这种思路，研究者多倾向于把现实中的政治参与概念移植到网络空间，借助现实政治参与的概念，把互联网视为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工具和新载体，认为互联网拓展而不是转变了政治参与的路径和方式，网络政治参与是对现实政治参与的补充与完善。

一、网络政治参与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含义

有关政治参与的含义，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正如诺曼·H. 尼（Norman H. Ni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1996）所说的，政治参与概念“由于意思实在太多，最终反倒失去它们的有效性”。斯卡夫（L. A. Scaff）从政治观的差异出发，把学界对政治参与的界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界定是强调政治的本质是对资源与权力的竞争，政治过程是权力的形成、分配与执行过程，因此政治参与是一种影响权力分配的“工具性行动”；另一种界定则强调政治的本质是维持社群延续、促进个体与团体间互助合作、鼓励公共沟通以解决争端，因此政治参与是一种为了促进共同目标，以平等、互赖、公开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决策的“交互性行动”（乐媛，2014：17）。不过在对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中，学者的关注点基本上集中在把政治参与作为“工具性行动”的层面上。即使是在把政治参与理解为一种工具性行动的意义上，由于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传统下工作，对其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其中合法程序论、影响决策论、利益表达论和观念-行为论，是从工具性行动层面解释政治参与实质的几种主要理论视角。

合法程序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或行动的行为，但合法程序论强调，只有通过合法程序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执行的制度化行为，才是政治参与行为，那些非法抗议、暴乱行为，则不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合法程序论强调合法参与的重要性。例如，诺曼·H. 尼和西德尼·维巴（1996）对政治参与的界定，明确排除了政治参与过程的非法途径，强调政治参与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动”，强调“我们关心的是‘体系内部’的活动——影响政治



的合法手段。这样，名目繁多的一大批行为——骚乱、暗杀和所有其他类型的公民暴力——就不在我们注意的范围之内了”。

影响决策论认为，一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或决策执行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政治参与，而不管这些行动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为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自愿性特征。例如，塞缪尔·P. 亨廷顿和琼·纳尔逊（1989）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指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包括自主参与和动员参与、合法参与和不合法参与等形式。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1996：290）认为，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王浦劬（2006）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途径介入政治生活，试图影响政治体系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尤其是影响决策过程的活动。影响决策论强调行动者动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明确指出政治参与仅指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若其指向的目标不是政府或并不是为了影响决策，则不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

利益表达论强调政治参与中参与者的利益需求表达。戴维·伊斯顿（1999）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政治参与界定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认为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结果，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反映到公共政策中去。这种参与体现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包括利益整合、利益表达、院外游说及代议制政治体系运作等。

观念-行为论主张将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等主观因素纳入政治参与分析范畴，认为了解政治知识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参与（李元书，刘昌雄，1995）。例如，巴恩斯将公民阅读政治文章、了解政治知识等活动都视为政治参与。威廉·F. 斯通也将“追踪报纸和电视报道”视为一种间接的政治参与（杨光斌，2000：23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各种互联网应用，如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络的广泛使用，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得到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强调，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空间正在逐步形成。网络空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使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再无可能；网络为人们的政治讨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并且使个体可以匿名参与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不过，综观学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我们发现，其所遵循的概念框架，大多延续合法程序论或影响决策论的路径，强调政治参与是参与者试图对政府或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政治行为，并把互联网视



为进行政治参与的新媒介、新工具和新平台，参与主体也由普通民众转变为网民和网络群体。例如，盛馨莲（2007）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社会公民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某一政治力量的决策之制定或执行目的的一种政治行为。公民在网络参与中，网络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它使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斌（2007）也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各种政治参与主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从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房正宏（2011）则把网络政治参与界定为参与主体以网络为参与平台，通过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两个向度实现政治参与，并试图影响政府、集体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决定及其活动的政治行为。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网络政治参与可被视为一种非制度化参与。“所谓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由政权所认可的，并由法律或制度所规定的合法参与方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即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公共行政进行干预的行为。”（张明新，2015：209-210）按照这样的分类，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尚未纳入中国法律或制度框架内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主要属于非制度化参与。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相比，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常常呈现出偶发性、碎片化、情绪化、非理性等特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

在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学界还较为关注对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探讨。对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分析，大致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路径侧重于从网络技术类型梳理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例如，曾凡斌（2013）认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包括即时通信、电子邮件、论坛、网络签名、博客、社交网站、微博、搜索引擎、网站等。而李雪彦（2012）认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有网络投票、电子邮件、政治博客、网络政治性论坛及网络结社。另一种路径则延续对现实政治参与的传统理解，从政治参与行为入手梳理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例如，李斌（2007）将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概括为参与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参与网络民意调查、借助网络与政党政府及政界人士进行政治接触、利用网络表达政治立场等。齐杏发（2011）则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包括获取时事信息、网络新闻跟帖、网络参政议政、网络信息传播等。此外，被国内学者在这一路径下提及较多的网